

中国
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
2015

耿立·主编
GENGLI·ZHUBIAN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
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
2015



耿立·主编
GENGLI · ZHUBIAN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5 / 耿立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859-1

I. ①中… II. ①耿…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2015 —汇编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896 号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5

Zhongguo Wenshijingpin Niandu Jiazuo 2015

主编 耿立

责任编辑 康征宇 卫银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58 千字 印张 19.5

ISBN 978-7-221-12859-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

历史里的细节故事

耿 立

自小我好听故事，对历史的记忆也来自一个一个独异的故事，但现在，本雅明说：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若有人表示愿意听讲故事，十之八九会弄得四座尴尬。似乎一种原本对于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对这一点，阿伦特在她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曾有过更深入的阐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算是对“讲故事的哲学”的一个形象诠释。阿伦特认为故事帮助人发现意义。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是向故事中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伊萨克·迪内森为例谈到过，故事拯救了她的生活，“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实际上，从书中提到的十个人物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这些人的故事显示了实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即使在缄默的“黑暗时代”。

和本雅明一样，阿伦特也有一种“殉道精神”，她的思想总是不免和政治挂钩起来。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但在现代要找个讲故事的能工巧匠，那是一件费力的事。

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的人，兼及两种故事好手——水手和农夫的二者之长，

能将“那种见识多广的人带回的远方的传说与那种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融会到一起”。这种人，既是一位找到人世间生活道路又知归来的远行人，又是族群历史记忆的承担者；既游历于广袤空间，又深深了解时间。可以说，正是讲故事的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维持与开拓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联结点。不过，“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个能很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

而讲好历史故事，也非易事，既要好看，更要真实，能讲好有思想的好看的故事，那是高人和上品。故事要有助于还原真相，传递立场和价值，故事使一些晦暗澄明，故事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故事里有情怀，故事里有敬畏。

对一战，我原本的记忆是浑茫的，但一天我看到了一辆长在树里的自行车，那是一张非常震撼人心的照片，那照片就蕴藏着丰富的故事。

一棵可以环抱的树，在树的腰部，一辆锈迹斑驳的自行车，被嵌入树的肉里，说的是1914年，一个小男孩把自行车锁在了树上后就去参加战争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而那辆自行车，也被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我还知道一个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再大清洗的时代，人们最害怕夜间敲门，大家怕秘密警察把自己抓去。有些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于被逮捕后的酷刑侮辱，一听敲门声，就选择从楼上舍身跳下。

在一个晚上，工作之余的革命领袖们在斯大林的别墅花园夜宴聊天，其中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苍穹里的一个星座的名称而意见分歧，一个说是猎户星座，一个说是仙后星座。而在一旁听着的斯大林笑起来，说这事容易解决，只要给天文馆打个电话立马就可搞清，于是就支派手下的秘书给天文馆打电话。

但原来的天文馆长，那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已经和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掉了，而新履任的天文馆长是个外行，原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他根本搞不清什么猎户星座仙后星座，但他知道斯大林秘书的电话的分量，于是夜间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但这位可怜的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被捕后一直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里，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然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那样紧急，以为是秘密警察来了，在哆哆嗦嗦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那汽车只得掉头去寻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那些刚被“清洗”的天文学家是好友。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从窗户可以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他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这位年已六旬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就从窗口纵身把自己交给了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费尽很多的周折，这位天文馆长总算在凌晨五点的时候打清楚了星座的名称，于是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

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我总以为，历史不是那些总结的大而无当的干巴的规律性的语言所能涵括，也非那些豪杰英雄的哄骗人的豪言壮语所能代表，历史是在最普通的故事里存活。

我们可以随手抓起很多的细节和故事，这是历史的筋骨也是血肉，是脉搏也是精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马上温和礼貌地对刽子手说：“对不起，先生，我踩了您的脚。”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路易十六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傅雷夫妇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面垫上棉被，免得倒下去时惊扰邻居，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还处处为他人着想。老托尔斯泰为世袭贵族，独自离开辽阔的庄园消失在野外，临终把家产分给穷人，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甚至他的墓地也特别寒酸，就在一个树林里，没有坟头和墓碑，只有野花野草。他的不朽作品也穿越时空留给了人类。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无疑，这些细节给我温暖，时间流逝，他们却从历史的缝隙间流淌出来，使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体温。我认为一个作家能讲好一个个故事，那就是一种最独特的表达，在故事中确证自己的文字，确证自己的价值。当然故事的格调源于心胸、气质、个人品位。故事是故事，人是人，但人也就是故事，故事也就是人，文字和故事源于生命，而非工艺，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故事就是生命本身，故事就是人格追求的象征。

伍尔夫《一个人的房间》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

如果把伍尔夫的话，置换成你和历史的关系，养成讲历史故事的习惯，做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不阿世，不低头，不鞠躬，不为利益集团开拓，不为强势粉饰，不做无聊的花边和细说，不假以科学的名义把饿死人的事化为乌有，不忘掉历史里的血泪和悲慨，要独立地握住历史的手，真实地面对历史的末日审判。那你就庶几接近一个讲好历史的故事的人了，我以为，你就是司马迁的表弟，也是伍尔夫的亲戚。

目录

不能忘却的追忆	陈忠实 / 001
独夫名贼	刘诚龙 / 015
陈恭怀的艰涩婚恋	裴毅然 苟蓝方 / 024
检点凌烟阁	
——晚年唐太宗	杨闻宇 / 028
杨士杰发言和杨荣甲的建言	丁东邢 / 033
旧时月色下的传奇	傅 铿 / 046
郭小川：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	朵 渔 / 052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地图	青 兮 / 065
敬一家地主子女的人生悲歌	
——乡村档案之二	毕星星 / 071
旧年的血泪	熊育群 / 082
无法湮灭的悲怆	耿 立 / 101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王彬彬 / 116
历代衍圣公	李木生 / 136
跨过海峡查档案	叶永烈 / 142

不可医治的乡愁	
——自然笔记	杨文丰 / 154
苏联的“告密文化”	郑异凡 / 167
两位巨擘的相遇	夏海涛 / 173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吗	安立志 / 178
梓园光影	吴昕孺 / 185
陈怀民：惊天一撞气贯长虹	刘宜庆 / 192
出场炫目，谢幕冷清	
——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	楚 梦 / 204
天下沈园	张凌云 / 214
当智商遭遇政治	陈启文 / 225
上海的心灵	陈丹燕 / 245
王朝的背影：恶政与恶棍集团	吴 思 / 271
滔滔天下，不知知己是谁？	王 立 / 277
卢作孚：末路告别	庄秋水 / 287
孟姜女用眼泪拆了帝国的墙脚	朱大可 / 292
大儒贾谊	马 军 / 297

不能忘却的追忆

陈忠实

走进小岗村

至今依然记得，六年前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心情很不平静。这个小小的小岗村，悬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多年了，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多年，不是夸张。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清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即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

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上书“大包干展览馆”。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动了，及至走进展馆，在看到那幅被放大的秘密盟约时，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上面有这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十八个干部和社员的签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久久凝视着那十八个签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约最后一行文字申明，如果此举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杀头，其子女由所有签名者共同帮助抚养到十八岁。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生死盟约的十八个结盟人，在签写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而能促使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庄的十八户当家男人豁出命来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怎样难以为继……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

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严俊昌”的名字上，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长，秘密联盟是他一手策划的，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获得呼应，就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任谁都会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约暴露，首当问罪的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任谁也都会想到，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土地分割成一块一垧，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耘、播种、除草，与集体化的大帮人群劳动的场景相对照，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无法掩盖更无法保密的事。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显然不会。这就让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态了。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经泛滥出伟大的感觉。

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张方正的脸，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我便看到一个睿智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他已六十六岁，我看到他的服装，是质地不错的西装，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我在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自进入小岗村，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掐指算来，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习惯上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即1960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

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看样子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过往是常有的事。而这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而且是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让我难免好奇，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又着重加一句，难民。

我随后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来到我们村子的难民。据说他先找到我们村子的主事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蔬菜地里趸菜卖菜，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据说俩人同意接纳这个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说，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力。顺便说明一事，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的蔬菜种植地，种植时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葱、洋葱、豆角、西红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冬葱、香菜等。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可以销售蔬菜，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甚至十多个社员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这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但也不能不说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这位安徽“难民”的恻隐之心。这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趸买两筐各种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他竟然在我们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

我约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早上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着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门前不过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远的窑洞，曾经是我隔壁一户人家的磨坊，一个圆形的石磨盘，两块同为圆形的磨石，曾经是村民磨麦子的好去处。不知何年何月窑洞的后壁发生坍塌，便没有人再进这孔危窑磨麦了。多年过去，尽管这孔危窑再没有发生坍塌，却也没人来磨麦了。这个安徽菜贩就住在这孔废弃的窑洞里，他每天出门卖菜、傍晚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暑假里我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约打扑克，往往选中这孔窑洞。阴雨天安徽菜贩也不能赶集卖菜，就只好待在窑里。我曾和他聊天，他尽管姿态很虔诚，却总是不多说一句话。我其实也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譬如，你跑这么远路到我们这儿来买菜卖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这买卖？他大约支吾着说，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类的话，搪塞一下。我大约也问过这样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生产队会允许你出门卖菜给自己挣钱吗？会不会扣下分给你的口粮？他依旧支吾着说他们那里的生

产队管得不严，可以外出，不指望生产队分粮了。我之所以会问这些，是依着我们当地的政策戒律产生的疑问，当地的农业生产队不允许社员私自出门做任何为自己挣钱的事，如有违犯，就不给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粮。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经听说他是逃难的“难民”的话题提出。他没有否认，却仍然支支吾吾着说是先遭旱灾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我大体相信了他的说辞，那时不仅安徽省遭灾，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村子也陷入饥谨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饥，且不赘述。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安徽菜贩，突然在某一天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竟让我惊讶半日。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某日，我到区上开会，主题是学习和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资料纪录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拍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个村庄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长满荒草，一个特写镜头映现的是一户人家围墙里的杆状野草，竟然长到高过围墙高过围墙里的房子的窗户，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这样荒芜的屋院连成一片……低沉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村民全部逃荒要饭讨活路去了，尽管没有说饿死人的事，观众大约都会想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着那一组令我惊诧的惨景时，突然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报后乘兴写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两句。他老人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虫病造成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几年之后又在中国乡村出现了。自然灾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当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乡村不识字的乡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乡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芜景象时，就想到那个安徽农民，甚至想象他也许就是纪录片中某个院子的主人……

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

徽菜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

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1978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相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1978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1978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1962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2005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1962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

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1922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1946年7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的态度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1962年4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5月10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麻烦和后来的自杀悲剧，概出于这篇《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文章。

包括《当前形势怀感》以及杨伟名此前的十余篇文章，都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中，我不必再赘述其全部内容，仅点出《怀感》一文中令我尤为感动到惊讶的两点。一是他竟然敢于提出“恢复单干”，即包田到户，这是任谁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却直白地呈报各级党政领导。联想到十六年后严俊昌秘密结盟的事，是做了杀头坐牢的精神准备的，杨伟名等三人却敢于把《怀感》送到从公社到中央的各级领导手中，难道没有考虑如

严俊昌们的严重后果吗？再一点是，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概念，也与今天科学论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类似。

杨伟名把《怀感》寄出后，很快就引发了用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的积极反响。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在《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内刊上予以选载，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宣传动态》也摘要刊登，无疑是给各级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咸阳地区专员的王世俊很赞同《怀感》，亲自给杨伟名回信说“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告诉他“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把《怀感》和附信印发给咸阳地区的几位领导参阅，破例把杨伟名这个农民聘为该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有非常举动，指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专门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并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由此可以判断，刘澜涛肯定读过《怀感》，尽管没有见到他的表态话语，也未能得知陶信镛和户县有关人士传达的刘澜涛书记的指示内容，但仅就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而猜测，起码是很重视杨伟名《怀感》的建议，也颇关心农民杨伟名这个人才。然而，恰恰是刘澜涛关于杨伟名《怀感》的相关资料，竟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导致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年轻人的灾难，也成为杨伟名的致命一击……

杨伟名和《怀感》的命运，不久就发生了逆转，不是一般的逆转，而是惊天动地的逆转。在《怀感》写成并寄出之后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且不说会议的主旨，单说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讲话，直接点到杨伟名的《怀感》。毛泽东以文章中有“一叶知秋，易地皆然”的话题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毛泽东主席又问对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并甚为郑重地申明“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我读到毛泽东这段讲话时，首先敏感于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这句致命的定性语言，这无疑是把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来信看成是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了。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刚一结束，9月初就有处理此事的工作组进驻杨伟名所在的户县七一大队了，而且是一个由省、市、县、社四级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杨伟名等三名写信人开始教育纠正的工作。

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给陕西省委打电话，询问杨伟名等三人《一叶知秋》的事，当属他亲自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反应。

1962年8月16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随即全文刊登《怀感》，

送省委常委阅读。前次该刊所作的《摘编》，是供各位领导克服“三年困难”决策的参考，此次全文刊登显然是供批判之用。

1962年9月7日，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与咸阳专署一位副专员，以及户县县委书记四人一起和杨伟名等三人谈话，且有四次，指出《一叶知秋》的错误。

1962年9月13日，中共户县县委将《一叶知秋》印发给县级机关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明确在通知中指明其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

在这样由省到县的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据说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各级领导的连番谈话指明其错误的过程中，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在最初一次谈话时，竟然神情自若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认识无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不仅和他谈话，而且和村里的所有党员谈话，在普通社员中召开座谈会，指出单干的错误导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集体化不能分解为“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经过甚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在三个写信人先后认识错误之后，接着便是程序化的关于这个事件处理意见的汇报。户县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省委、省委对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个写信人的处理意见，共同的观点是三个党员主张“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之后，各级领导在各种会议上都有涉及这个事件的讲话，指出其错误是“退到资本主义道路”，最严厉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一次全会上说：“杨伟名们分田到户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就我能见到的各级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这一句是最严厉且最严重的，即“荒谬”和“反动”，而且足足是“十分”。

在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形成时，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监委会意见完全一致：“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此事终算了结，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大约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写到这里，我竟有一种感动，一封惊动毛泽东主席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为“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这个事件搞得从户县到咸阳专署到陕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几乎“手忙脚乱”，况且有省委第一书记“十分荒谬十分反动”的定性，处理意见却是“不给党内纪律处分”。我感觉到一种温情，一种包容的温情，也应该是处于“三年困难”特